

Globethics Repository



評《神聖的經濟：神學與市場》 [A Comment on Divine Economy: Theology and the Market]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Gao, Zhe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9-16 19:53:14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5199

評《神聖的經濟：神學與市場》

高喆

香港中文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系博士生

神學言說經濟在基督宗教傳統中並非新鮮事物，《舊約》時期的先知當是其先行者，阿奎那（Thomas Aquinas）亦在他的時代為這種探討作出過足夠多的努力。然而在現代西方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日益成熟和發達的今天，神學對經濟的談論似乎正變得越來越沒有必要，尤其是在經濟學家一方看來更是如此。但一些神學家並不這樣認為。儘管所採用的方式和觀點不盡相同，但他們都熱衷並致力將基督教神學的資源引入經濟問題的討論中，以神學言說經濟。

作為激進正統神學（Radical Orthodoxy）*的代表人物之一，斯蒂芬·朗（Stephen Long）在這本極富批判性的《神聖的經濟》（*Divine Economy: Theology and The Market*）¹中，致力探討當代神學家在處理經濟問題時所採取的三種主要進路，並對其作出評價。朗跟隨米爾班克（John Milbank）的神學方法，嚴厲批判了韋伯主義者（Weberian）將事實—價值分離（fact-value distinction）的策略以及採用這種方式將神學與經濟學相關聯的神學進路。在朗看來，

* 或譯「基進正統神學」。有關討論可參《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23（2005）的主題「激進正統神學」。——編注

1. Stephen Long, 《神聖的經濟》（*Divine Economy: Theology and The Market*; London: Routledge, 2000）。

神學認可社會科學的自治，就意味着其在處理經濟問題時必然會放棄特殊的神學語言，放棄基督論與教會論的核心地位，從而使基督教的美德從經濟生活中退出，取而代之的將是資本主義的「效用」——這樣一種經濟生活將最終走向虛無主義。相反，朗嚴格堅持神學本身的正統性，堅持神學語言的豐富性及不可或缺，主張神學應成為社會科學的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以令經濟生活最終走向上帝認可的目標（telos）。

作為該書的框架，朗區分了三種令神學與經濟相關聯的不同進路：支配傳統（dominant tradition）、新興傳統（emergent tradition）以及遺留傳統（residual tradition）。第一種傳統中的代表神學家包括了諾瓦克（Michael Novak）、斯塔克豪斯（Max Stackhouse）、普萊斯頓（Ronald Preston）、麥卡恩（Dennis McCann）以及沃根曼（Philip Wogaman）等人。這傳統的神學家在某些具體的政治主張上雖有不同意見，然而在經濟問題上都支持二十世紀末主流的經濟觀念，即主張一種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並輔以民主政治與之相配套。這些神學家們不約而同地認可韋伯（Max Weber）的事實—價值之分離作為其基本方針。在這方針下，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因被認為談論的是一種與價值無涉的客觀事實，因而成為自治的。對其所談論的東西，神學非但不能干涉，還要予以承認，而神學所能做的，只是從外部為這樣一種經濟提供價值或意義（如諾瓦克的「精神」及斯塔克豪斯的「風氣」）。在以這種方式將神學與經濟學關聯起來時，支配傳統的神學家又同時選擇了以一種「自由類比」（*analogia libertatis*）作為聯結二者的中介。朗視這種對自由的談論為一種人類學，因為其中並不包括神學的真、善、美，相反，它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

自由。正因支配傳統中的神學家以這樣一種人類學的自由作為起點來談論上帝，其神學必然不以基督論和教會論作為其核心，因而必然喪失特殊的神學語言對真、善、美的談論。事實上，支配傳統的神學家們都主張一種後認信的神學（post-confessional theology），即神學可以離開傳統的神學語言而與世俗科學和倫理展開充分的合作。朗認為，支配傳統的神學家所有的上述努力最終帶來的結果，是真正的神學傳統之喪失，基督教神學中的具體主題被忽視，人類學的自由類比反而成為基督教之上帝的後設敘事，而非上帝自身在耶穌基督中的啓示，因而也就不可能有關於真、善、美的談論為這種自由指向一個最終的目標。

這一點同樣體現在支配傳統的神學家對罪的談論中——他們所強調的罪亦是一種抽象的範疇，因為這種罪並非某種真、善、美的反面。這樣一種抽象的對罪的理解，其作用只能是消極的，罪與善脫離，僅僅在其自身被強調，因此人們很難做向善的努力，而只能消極地認可有罪的現狀。另一個很重要的方面——為支配傳統的神學家們所認為是「事實」的那部分經濟生活，實際上卻並非價值中立的。無論是資本主義將人與其它商品抽象地等價，還是將效用作為衡量一切選擇的標準，都不可以被看作僅僅是客觀的事實，因為其中都已經蘊含了某種價值。正因如此，支配傳統對當代西方經濟學的認可，以及為了支持民主資本主義而對神學傳統的放棄，最終的結果是，資本主義之抽象的功利主義成為社會的主導價值與目標，整個世界邁向虛無。事實上在朗看來，支配傳統的神學家對資本主義的談論並非是由神學出發的，相反，他們是因為贊同某種社會科學理論才反過來應用神學的——社會科學反而成為了神學的解釋者，神學因此注定會被抽象化。

朗所區分出的第二種傳統即新興傳統，主要是以美洲的解放神學為代表，其中的神學家包括了科恩（James Cone）、古鐵雷斯（Gustavo Gutiérrez）呂特爾（Rosemary R. Ruether）及索布里諾（Jon Sobrino）等。這傳統與支配傳統最大的區別在於，解放神學家們拒絕基督教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兼容性，相反都或多或少地尋求某種社會主義道路。同支配傳統的神學家不同，解放神學家們的神學工作並非以某種社會科學的觀點作為起點，神學只是為了對其作出輔助性的支持。解放神學的起點是神學的，科恩等人正是看到了某種社會處境中人們所遭受的苦難之現實與基督教真理之間的衝突，才着手進行批判並進而尋求一種解放道路的。這一點在朗看來，無疑是解放神學的成功之處。然而當解放神學試圖暴露資本主義制度之不公時，解放神學卻在一定程度上離開了神學，轉而借助社會科學的分析工具（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達致這目標——這一點顯示出其與支配傳統的共同之處，即同樣採用了韋伯的事實－價值分離之方針。當解放神學家們進一步尋求解放的道路時，這問題就暴露得更為明顯了。無論是呂特爾之脫離教會論、基督論傳統的世俗末世論，還是古鐵雷斯以拉納（Karl Rahner）的神學對教會論的相對化，抑或索布里諾關於「上帝之國」的觀念，其方法都是一種世俗倫理與神學語言的分離，所造成的結果在朗看來與支配傳統一致——關於上帝的談論已成為自由的類比。在這一點上，兩個傳統之間絕非對立，而恰恰是一致的。

朗進一步指出，解放神學對神學語言的相對化，事實上反映了它和支配傳統分享了一種一致的世界觀，即一種關於稀缺（scarcity）的形而上學。這種形而上學不僅是資本主義之競爭、犧牲、效率、機會成本等核心觀念產生的

主要原因，它更使得支配傳統與新興傳統的神學家將談論上帝的語言亦視為稀缺。因此，解放神學家們在相當程度上拒絕基督教神學語言自身的豐足性，這表現在他們將基督論和教會論相對化的同時，將神聖啓示普遍化，並力圖以自然的方式尋求有關解放的倫理。這種對神學稀缺性的認可，特別體現在呂特爾和科恩對蒂利希（Paul Tillich）神學之應用上。蒂利希對象徵的使用影響了二人對於神學語言的觀點：一方面神學語言本身因其歷史性而總是不充分的，另一方面使得傳統基督教語言之外的上帝談論成為可能。因而二者不約而同地令神學語言次要於一種關於存在的形而上學的、形式的語言。而古鐵雷斯和索布里諾雖然沒有像前兩者那樣多地訴諸蒂利希的神學，但在將神學語言次要化上卻與二者無異。正因如此，在朗看來，新興傳統的神學仍是一種將基督教神學之實質內容抽象化、形式化了的神學，在其中基督論和教會論成為需要被克服的難題，其所能為事實提供的價值，也只能是和支配傳統一樣的自由之類比。因此，解放神學仍然沒有脫離現代性的框架，在其中，社會科學得以自治而神學被邊緣化，或者令關於存在的形而上學成為神學の後設敘事。

最後一種將神學與經濟關聯起來的進路被朗稱為遺留傳統。從名稱我們即可發現這傳統絕非當今神學的主流，然而它卻是朗最認可的一種對經濟的神學談論方式，這一傳統包括了登普西（Bernard Dempsey）的神學、天主教社會訓導的某些內容、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以及米爾班克的神學。遺留傳統與前兩個傳統的最大區別，在於它明確地拒絕韋伯主義事實—價值的分離，要求恢復神學——特別是阿奎那神學——判斷某種社會科學的權利。這種神學拒絕社會科學所謂「事實」這領域的自治，而力圖

將基督教神學關於真、善、美的言說注入經濟生活，使世界擺脫目前的虛無主義方向，朝向一個上帝所喜悅的目的。正因如此，遺留傳統並不通過社會科學和世俗倫理來獲得一種形式的倫理原則，相反，它堅持基督教傳統本身對美德言說的有效性；它並不捨棄傳統，相反視後者為經濟倫理之最重要的來源。

對遺留傳統內的神學，朗並非等量齊觀。在他看來，天主教社會訓導的內容雖然是出自基督教傳統，然而由於其對普世性的追求，導致訓導的語言太過形式化和一般化，以致所有立場都能從中找到其適用性。正由於其神學敘事的丟失，天主教社會訓導並未充分反現代的倫理要求，反而迎合了某些現代形式的倫理要求。與此同時，對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以神聖家庭（Holy Family）的觀念為基礎批判自由主義經濟哲學的努力，朗依然讚賞有加。同樣，朗在相當程度上認可登普西以公益為目標的「功能性經濟」（functional economy）理論。他認為，登普西以經院傳統中的道德神學批判西方經濟傳統是一項非常正確的工作，然而，後者在完成這項工作時，並未堅持阿奎那神學中的超自然和自然之間的不可割裂性，而是認為通過訴諸普遍的道德自然律，即可得出一種恰當的經濟倫理，其結果是再次為基於自然律的社會科學之自治提供了空間。而朗認為，恩典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就像新律法和舊律法之間那樣不可分離。自然並非在例行的失敗之處才需要恩典的介入，相反，自然在一開始就需要恩典為其指明方向和意義——自然應永遠是被恩典化的自然，它無法單獨成為道德的基礎。在這一點上，麥金泰爾的神學保持了新律法的中心地位，他的「功能性經濟」批判將道德作為私人的價值偏好（private value preference），堅持經濟生

活應有確定的價值與目標。為此，麥金泰爾堅定地認為，經濟生活所需的道德必須於上帝在耶穌中的自我啓示，以及不斷呈現這啓示的教會生活中尋找——完美的道德不可離開恩典，只有通過恩典人們才能建立起恰當的自然美德。

儘管如此，朗依然堅持認為米爾班克的神學才是遺留傳統中最為卓越的。通過他對後者思想的闡述，我們很容易發現其中的原因：首先，米爾班克肯定上帝所創之美，這種對美的訴諸，完善了登普西和良十三世的真以及麥金泰爾的善，將二者從一種稀缺的形而上學中徹底解放出來，並建基於上帝的創造之豐足。第二，米爾班克的神學徹底地反對社會科學可以單獨存在，他堅持基督教神學可以成為所有社會科學的後設敘事，將其納入自身的邏各斯，因為上帝的存在既超越又內在。第三，米爾班克強調基督論與教會論的核心地位，前者呈現於上帝成人在耶穌之中的行動，後者則持續不斷地重複這行動的意義。最後，米爾班克所主張的神聖經濟建基於贈與（gift），這使得交換成為一種贈與的相互回報，而非資本主義那以稀缺為前設的犧牲（sacrifice）。在這種相互贈與中，人們不需依靠征服和競爭而分享上帝之贈與的豐足，而教會將成為這樣一種神聖的經濟之基礎。

在《神聖的經濟》一書中，朗表面上是在討論經濟，事實上卻在探討一種神學的方向。借助對不同神學言說經濟的方式進行分析，朗試圖向讀者指出，米爾班克的激進正統神學進路才是基督教神學應該對現代性採取的最為恰當的態度。這並不是說朗所探討的經濟問題並不重要，恰恰相反，激進正統神學的進路正是通過論及經濟、政治這類有關現代性的核心問題，才能體現出自身的生命力所在。更何況在所謂的「世俗」領域裏，也許沒甚麼比幾乎

已主宰整個世界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及其所帶來的文化更值得神學家們關注了。

現代性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一個自然脫離超自然、理性脫離恩典的過程，基督教神學也在某種程度上順應了這方向。而朗沿着米爾班克的道路所做的，正是回到阿奎那的神學以重新整合二者。在朗看來，造成韋伯主義事實一價值之分離的出現並成為主流觀念的原因並非其他，而正在於基督教神學自身認可了自然與超自然的分離，因而支配傳統、新興傳統，甚至在遺留傳統中登普西的錯誤，都在於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一種純粹訴諸理性的自然神學觀點。朗認為，阿奎那的神學從來沒有認可自然可以完全脫離恩典，沒有恩典的美德，自然美德也就無法建立，因此對阿奎那而言，「就神學來說，沒有科學是自治的」。²恩典與自然之分離的後果是明顯的：首先是事實一價值的分離——正因為社會科學的自治才有了所謂價值中立的「事實」領域；第二，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恩典與自然之分離的結果，在不少神學家那裏，恩典通常是在理性失敗的地方才會出現，而不是一開始就與理性相關聯，這自然會造成傳統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非理性的；第三，當自然單獨發現上帝的真理成為可能時，正統與異端之間的分別就會變得模糊，正因如此，米爾班克稱資本主義為基督教的異端。³所以在朗看來，神學處理經濟問題並不在於找到一種恰當的社會科學，相反，一種真正包含真、善、美的社會科學是由神學出發的。因此，沒有作為事實的經濟，只有神聖的經濟。基督教神學必須成

2. 同上，頁 246。

3. 同上，頁 258。

為社會科學的後設敘事，像米爾班克所做的一樣，將自然超自然化。

在今日全球資本主義的背景下，對於糾正資本主義經濟價值的虛無主義傾向，同時建立一種包含真、善、美的經濟秩序，朗的神學經濟學進路顯然有着建設性的意義。然而就其在這本著作中的討論而言，並非沒有問題。首先，朗在論及支配傳統時，對諾瓦克之「自由」概念的批判並不十分準確。諾瓦克在其《天主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Cathol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書中，特地強調了自由應是有序的，自由離不開美德，且遵循真理是自由定義的一部分。⁴雖然諾瓦克對自由主義經濟學之「事實」的認可，使其欲將基督教作為民主資本主義之「精神」的努力最終失敗，然而就此指責支配傳統的神學家通過一種人類學的形式自由觀念來談論上帝，並不十分公平。

第二，啓蒙運動本身是一個與傳統脫離的過程，這過程到今天仍未停止。朗讓我們看到，失去傳統的社會生活必然失去其內在的價值，這一點毋庸置疑。朗所做的也正是，試圖將經濟生活重新基督教傳統化，神學成為社會科學的後設敘事正是服務於這個目的。然而，神學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成為諸如經濟科學的後設敘事，仍然是個疑問。經濟學本身無疑需要神學為其指出符合真、善、美的目標，並在一定程度上批判現行經濟制度中與這目標相抵觸的部分。但是神學究竟能在有多具體的程度干涉某種經濟政策或決定某個經濟環節，仍是不確定的。神學也許能夠決定某個經濟環節是否符合真、善、美，但它也許沒有能力知道這種經濟運行方式是否是所有可能方式中最好

4. Michael Novak, 《天主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Cathol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頁 93-99。

的——就市場的存在而言，它帶來的競爭肯定是朗所不願看到的，然而在傳遞供需信息的作用上，很難想象還有其他方式會比市場更為有效。

第三，朗所贊成的神聖經濟在米爾班克那裏以教會作為基礎，他承認，這種基於贈予的經濟如何具體化仍不明朗，但卻堅持認為，它是一種包含真、善、美的經濟之正確方向。然而我們發現，朗在批判資本主義經濟時，在相當程度上忽略了對消費主義的批判，而後者恰恰是當代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最嚴重問題之一。隨着世界範圍內的資本主義經濟日益成為「需求經濟」，整個經濟的運行都必須圍繞怎樣刺激需求以維持資本主義市場的正常運轉，消費因此成為整個經濟的中心環節從而具有決定性。而一種由消費決定的經濟必然建基於殘酷的競爭之上。在某種程度上，現實的問題並不在於競爭是否與上帝創造之豐富相抵觸，而在於資本主義經濟的運行方式決定了其是不可逆轉、不可停頓甚至不能放緩的，而這一切的前提是購買力的足夠。因此，消費不息，競爭不止。在這種環境下，任何不以利潤為最高目標的經濟個體或團體，只要其進入這個市場，就面臨着被淘汰的命運。因此，以教會為基礎的神聖經濟能否在這全球市場中生存，還是這種經濟只能在教會內部展開，而後者是否可能、如何開始，都存在着很大疑問。此外，朗忽視對消費主義的批判所帶來的另一個後果是：他只注意到資本主義給人帶來的是形式上的自由，卻忽視了在一個消費社會裏人們事實上缺乏自由！因為在這樣一種社會中，人們已經成為商品拜物教的信徒和與慾望的奴隸，所謂的「自由」最終也是為商品服務的。

最後，資本主義經濟所倚賴的自由傳統本身確實是形式化的，其中的自由沒有確定的目標與價值，因而最終將

走向一種虛無主義——在這一點上朗無疑是正確的。朗在論及這種形式的自由時認為，自由本身沒有任何善，只有當其與某真、善、美的目標相關聯時它才是善。然而悖論就在此產生了——沒有這種形式的自由本身，朗對今日資本主義的批判、對基督教之美德的言說也許就不可能了。沒有任何人可以保證，如果自由曾經不是以這種形式化的樣子出現，那麼它一定就是基督教傳統認可的自由。換句話說，沒有這種形式化的自由，世界也許不會走向「無」，但卻很可能走向「惡」——正如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蘇聯和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大陸。在那樣一種情況下，不是將自由導向某種目標的問題，而是連選擇的機會都沒有。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於最終指向真、善、美的自由而言，一種形式的自由是必須的，沒有前者就無從談起後者。當然，僅有前者是遠遠不夠的，這正是斯蒂芬·朗希望我們認識到的問題。

作者電郵地址：mgaozhe@hotmail.com

A Comment on *Divine Economy: Theology and the Market*

GAO Zhe

Ph.D. Studen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Stephen Long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radical orthodoxy. In his critical work, *Divine Economy: Theology and the Market*, he discusses and appraises three strategies assumed by contemporary theologians to deal with the questions of economics. Following the theological approaches of John Milbank, Long assumes a critical posture to the Webrian strategy of fact-value distinction and to the theological approaches that make theology relevant to economics in this way. In his view, theology agreeing with the autonomy of social science means theology abandoning specific theological language and the centrality of christology and ecclesiology when it deals with economic questions, so that the Christian virtues are retreating from economic life and replaced by the "utility" of capitalism, which makes economic life tend to nihilism. Long strictly maintains the orthodoxy of

theology, the richness and the indispensability of traditional theological language, and claims that theology should become the metanarrative of social science, in order to adjust economic life to the telos of God.

